



三年自然灾害遇上大旱 (资料片)



大锅饭没能吃多久。(资料片)

▲王可忠老人讲述当年的苦日子。

我所经历的

三年自然灾害

老人说:饥荒人为因素多

■口述人:

王可忠,男,1934年生于泊于镇泊于村
于福仁,男,1945年生于泊于镇金鸡山后村
刘玉官,男,党员,曾任公社干部,1926年生于泊于镇蒲湾村

■采访人:

井东民 唐燕飞

■整理人:

本报记者 高洪超

■小资料

三年自然灾害

1959—1961年发生于山东、河南、安徽等地,是新中国成立后最严重的大灾难之一。但有人认为这一提法不确切,应叫“三年大饥荒”,因饥荒更多因素是人为造成的。是“自然灾害”,还是“饥荒”,威海泊于镇几位老人的回忆,或许能让我们找到解答。

酒糟纸浆果腹

1958年,王可忠在外地教书,老伴留在村里,感受最深刻。她用“要吃的没吃的,要烧的没烧的”形容当时的生存状况。

那时,王可忠夫妻要养活一位老人,3个孩子。生产队按工分发粮食,一年折算下来,王家6口人每人每月只有十几

要凭证明购买

斤粮食。于是,草根、酒糟、花生秧子、地瓜蔓子、玉米棒芯、纸浆都入口果腹。王可忠的老伴回忆,像酒糟、纸浆、玉米棒芯这样的“食物”还要到大队开证明,才有资格去大集上购买,否则就是有钱,也没人敢卖给你。那时,纸浆是2分钱一斤,吃法是,与海菜一起下锅,

煮沸后吃。

欺骗了胃觉,却骗不了肠道。王家小女儿当时3岁,吃纸浆后无力消化,几天拉不出屎,大人只好一点一点地帮她把屎抠出来。

营养不良,王可忠的母亲得了水肿病,患此病的村人很多,因此病死了不少人。

男人干一天活

虽已过去近50年,于福仁关于饥饿的印象依然深刻,叙述中充满了后怕。

于福仁补充说,凭证明买玉米棒芯,数量还要受限制,买得过多要被没收,防止“投机倒把”。于福仁有一段赶集买玉米棒芯的亲身经历:1961年农历二月二,天下着小雨,

只够换一斤玉米棒芯

父亲饿得走不动路了。母亲让16岁的他去赶桥头集买玉米棒芯,那天的价格是每斤一毛八分钱,他花了10.8元钱买了60斤。当天幸亏他回来得早,几个买玉米棒芯的村民被抓到一个大院,税务人员要求他们再开条子,证明不是“投机倒把”。

10.8元在上世纪60年代算是一笔不少的钱,这是于母的血汗钱。于母白天下地挣工分,晚上为生产队绣花。于父带病在生产队干活,一天拿10个工分,约合一毛八分钱。一个成年男子干一天的报酬竟只够买一斤玉米棒芯。

于福仁认为大饥荒是人为造成的。

他清楚地记得1958年7月“大跃进”开始,“以钢为纲”,金鸡山后村建起一个小型炼铁炉,青壮年劳动力去运砖、铁矿石。不久,村里又搞公共食堂,吃“大锅饭”,农业生产集体劳作,学校集体吃饭住宿。因成年男子劳动力去大炼钢铁,农田全由学生和妇女打理,而且“上山一条线,坐地头一大片,刚起来拔两棵草,又打铃吃饭。”劳动积极性很差。

再不久,当地流行“卫星田,小麦亩产过万斤”的口号。泊于公社有一所“红专学校”,1958年元旦,正上小学的于福仁和同学去红专学校学习卫星田经验,会上有人提出:一亩卫星田,种下600斤麦种,一粒麦种可结出一

个麦穗,一个麦穗又有40个麦粒,这样一粒麦种就变成了40粒,小麦亩产也就达到了2.4万斤。会后,学校领导带大家参观卫星田。于福仁看到田里的麦苗长得郁郁葱葱,但次年4月他再去开会,却发现麦苗全不见了,偷偷一打听,原来麦苗死掉后全拔掉了。

刘玉官说1958年“浮夸风”非常盛行,说大话的人有光彩,小麦亩产报得多,给红旗,报得少则送白旗,于是只好“一级熊一级”。刘玉官补充说,其实1958年秋天地瓜大丰收,大量地瓜埋在地窖里,烂了很多,这导致1959年春天缺粮。

不过,王可忠的老伴认为大饥荒也与天气有关。她记得1959年夏秋天旱,地瓜长得很小,这造成粮食减产。

威海口述史抢救工程
本报与威海市档案局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新闻学院联办